

# 王亚南佚信佚文辑释

封越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内容提要]**《王亚南全集》编者付出了极大努力,将王亚南生前几乎所有文字一网打尽。但仍有漏网之鱼。现从各种书刊辑得《王亚南全集》失收佚信佚文十余篇,另搜得1947年至1951年王亚南致经济史家彭泽益未刊信函三通。从这三通信函可以钩稽出王亚南这一时期的一些事迹以及学者之间的交往,有助于丰富我们对王亚南生平事迹的认识。

**[关键词]**《王亚南全集》;佚文;王亚南;彭泽益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24)04-0113-07

DOI:10.13469/j.cnki.zgshjjsyj.2024.04.007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教育家。王亚南一生著述丰硕,20世纪80年代以来,厦门大学学者持续不懈搜集整理出版王亚南论著,在2021—2023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煌煌20卷1000余万字的《王亚南全集》(下文简称《全集》)。有关王亚南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除众多单篇论文外,有关专著已经出版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sup>①</sup>王增炳、余纲编《王亚南治学之路》、<sup>②</sup>韦曙林著《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探源:王亚南经济思想的启示》<sup>③</sup>等,传记有蒋夷牧、王岱平《生命的辙印》<sup>④</sup>和林坚《王亚南传》。<sup>⑤</sup>《全集》编者付出了极大努力,其第一个特点即是“全”,编后记称“按照‘应收尽收’原则,将王亚南生前发表的几乎所有文字‘一网打尽’”。但由于一些书刊搜寻、检索不易,《全集》仍难免有“漏网之鱼”,书信由私人和机构收藏,搜集更为困难。

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之子彭弘兄保存有王亚南1947年至1951年致彭泽益未刊信函三通,近日承彭弘兄惠赐笔者整理发表。本文拟将这三通信函略加考释,并钩稽王亚南这一时期的事迹及学者之间的交往。为省篇幅,中山大学校史、厦门大学校史、清华大学校史或王亚南传记中已有记载者不再展开。笔者另外搜寻到《全集》佚信2通、佚文十余篇,本文亦一并罗列,以飨学界,并补《全集》之阙。

彭泽益(1916—1994),原籍湖南常德,出生于安乡县。1938年10月至1942年8月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次年8月考入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专攻中国近代史,1945年8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历史系助教至1946年11月。1947年1月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工作。社会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编号:中国经济史DF2023YS2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所学术发展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4-06-03

- ①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 ②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 ③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 ④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 ⑤ 厦门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研究所 1949 年后隶属中国科学院,1953 年改名为经济研究所,1977 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彭泽益一直在此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在太平天国史、中外经济关系史、手工业史、财政史等领域卓有建树。在中大读书时,彭泽益与王亚南的关系颇为密切,并在王亚南等老师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毕业后,彭泽益一直和王亚南保持书信联系,研究上有问题彭泽益也多写信向王亚南请教。1942 年 9 月彭泽益到重庆国民政府军训部任秘书,工作了一年左右,王亚南曾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找重庆的进步人士建立联系。1943 年王亚南到重庆,还与彭泽益见面。1953 年 9 月,王亚南到北京参加综合大学会议,又曾约彭泽益去厦门大学教书。1950 年后,彭泽益多次在自述中将王亚南列为主要社会关系之一(本文有关彭泽益自述材料皆来自经济所藏档案及彭弘兄提供,不另说明)。

第一通:1947 年 5 月 9 日致彭泽益

泽益学弟如晤:一别数年,人事诸多变改。拙著《社会科学论纲》再版扩充,改为《社会科学新论》,不日将寄一册来。《社会科学》第一卷四期手边有一份,兹附寄,唯第一篇《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法则问题》(笔者按:原信无书名号,系笔者所加),系我在此间讲中国经济史之讲义,排错甚多,连项目亦多排误。其他各期,即去函该所,看可否奉赠贵院一全份。卓兄去新嘉坡。胡先生“优则仕”,刻下应已觉得够味了,有信来往否。另纸盼代交希孟先生。亚南  
五,九。

此信信封为国立厦门大学信封,寄“南京鸡鸣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彭泽益先生”,系航空信,贴有国币 100 元邮票 2 张、50 元邮票 1 张。正面邮戳为“厦门 9.5.47”,背面邮戳为“南京 三六/五月十一/十四”,当系 1947 年 5 月 11 日 14 点到。有意思的是南京邮戳是民国纪年,而厦门邮戳为公历。信纸为红色“国立厦门大学办公用笺”,上端中间印有“止于至善”校徽。

1942 年彭泽益从中大毕业后,曾任重庆国民政府军训部秘书,此后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攻读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又到中研院社会所任职。王亚南也在 1943 年从中大辞职,到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5 年 9 月任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中大的同事行踪也多变化,故信中说“一别数年,人事诸多变改”。《社会科学》由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辑发行。当时中央研究院没有总图书馆,《社会科学》如要寄赠,当是赠送社会研究所。现在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未收藏该杂志,因经济所图书馆藏书亦有散失,难以确定当时是否赠送。《中国社会经济史上的法则问题》收入《全集》第 17 卷时改正了原文若干错误,如“起于我们的传统的历史认识及我们历史本身显示的诸社会变象”一节编号“(二)”改正为“三”,原文注十二“经济学批判”改正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卓兄即卓炯(1908—1987),湖南慈利人,1931—1935 年就读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1946 年在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彭泽益在中大时与卓炯较为接近,政治上受卓炯影响。彭泽益从中大毕业后还与卓炯有通信联系。1943 年卓炯寄给彭泽益一篇用马列主义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学错误观点的文章,托彭泽益找地方发表。彭泽益觉得文章很好,亲自将此文送到重庆《新华日报》馆,投给《群众周刊》。不久《群众周刊》发表了卓炯的这篇文章,彭泽益买了一本刊物寄给卓炯,卓炯很高兴。因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1946—1948 年卓炯被迫出走泰国,现有卓炯的传记只说去泰国,此信提到去新加坡,有待考证。彭泽益与卓炯在 1951 年恢复联系,1955 年 2 月卓炯来北京参加中宣部会议,与彭泽益见过面。

本信和下面两信中的胡先生皆是胡体乾(1895—1977),吉林人,1931 年至 1945 年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序言里首先感谢的就是胡体乾。1946 年胡体乾任吉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所以王亚南信中说他“优则仕”。彭泽益回忆在大学期间“最接近的老师是朱谦之、胡体乾、王亚南、卓炯四位”“我愿意和他们接近主要他们是当时学校中的进步教授,学问好,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和做学术研究的方法和一些经验。直到现在我对他们还是抱着尊

敬和感激的心情”，认为胡体乾“态度开明进步，学问比较渊博，佩服他，常和他接近”，通过胡体乾而认识了王亚南和卓炯。1949年后彭泽益与胡体乾恢复了通信联系。1953年暑假胡体乾回北京探亲，曾到彭泽益家里长谈一个上午。1954年10月胡体乾在北京医治眼疾，与彭泽益相互看望。

本信和1951年信中的“希孟先生”为程希孟（1901—1976），字次敏，江西南城人，曾参与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1938年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任职于国民党宣传部、国民政府外交部。1947年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工作，1950年5月回国。程希孟自称是王亚南的老朋友。1942年左右在重庆，彭泽益经王亚南介绍与程希孟结识，来往较多，有些文章请程希孟看过，并征求程希孟对文章的意见。1953年初彭泽益全家迁往北京，曾在北海小石作程希孟住处借住了一个多月，并请他代为校订手工业史资料英文译稿，平常也到他家去玩。

第二通：1949年11月15日致彭泽益

泽益兄：

十一月三日来信收读，知现状尚好。我于本年一月离厦，五月离港北来。现在清华教两门课，政治经济学与马列主义，因为都是自己愿教的，所以特别感到兴趣。我打算在两三年内不离开北平，也不愿担任任何行政工作。胡先生现在沈阳农学院任课，是九月间才去的，未去前，我们也像在砾石那样一样谈几小时。人是老了，思想却新了一些。胡太太还在北京。知关注，特以附告。

前天我们召集了一个“资本论译本通俗化座谈会”，打算把这部书弄得更适合大众要求一点，这也是我无法离此他去的原因之一。

陶先生代问好。

祝进步。

亚南十五日

按：此信信封正面左上印有中英文“国立清华大学”，寄“南京鸡鸣寺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彭泽益先生”，落款“清华大学照澜院18B”，邮票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面额100元，邮戳“北京”“15.11.49”即1949年11月15日，背面无邮戳，彭泽益手写“十一、十九到”“十二、十四复”。

王亚南1949年5月到北平，次年5月24日被教育部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6月15日自北京启程去厦门。王亚南在北京仅短短一年，但这是他在教学、著述和社会活动上极为忙碌的一年，如1951年2月8日致彭泽益信中所说“倒是在清华的那一年，才真是忙得可以”，也是成果丰硕的一年。

王亚南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及具体情况在有关传记中语焉不详。<sup>①</sup>据清华大学校史资料，1949年6月22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聘请王亚南为经济学系教授。<sup>②</sup>与王亚南同时被聘请的有中文系教授郑振铎、化学工程系教师恽魁宏，这一消息在《光明日报》7月12日、《大公报》（上海版）7月17日均有报道。9月23日，清华大学第24次校务委员会会议通报了华北高教会核准聘任王亚南等教授名单。<sup>③</sup>根据文管会制订的教职员工薪给标准，教授、副教授月薪为小米800—1300斤。清华大学教职员工薪评定办法为学术以论文专著计分，年资从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历）算起，按年计分。据10月4日《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评定支薪数额清册》记载，王亚南的支薪额为

① 林坚：《王亚南传》，第211—212页；《王亚南生平大事记》，《王亚南全集》编纂委员会编：《王亚南全集》第20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471页。

②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一百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③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下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05页。

## 1 135斤小米。<sup>①</sup>

王亚南入职中山大学时即声明自己“志在研究,其他一切均无兴趣”,<sup>②</sup>这封信中又表示“也不愿担任任何行政工作”,王亚南在清华短短一年时间可谓潜心教学与著述。据当时报道,王亚南在政治经济学第一课中就明确向学生指出:“它不但供给了基本的经济知识和了解社会的能力,同时还是一个改造思想的课程”。课程采取讨论方式,由同学提问,因为担心同学们有时提不出问题,或者提出问题而过于琐碎,教学委员会每次事先拟一份问题提纲,以供同学参考。班上经过讨论不能解决的问题,会后汇集到教学委员会,由教学委员会加以比较和综合,班教员们反复研究讨论,最后得出一个正确答案,上课时由王亚南向同学报告。<sup>③</sup>王亚南还积极参与当时的教学课程改革。1949年9月23日,清华大学第24次校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全校公共必修课程委员会改组为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教学委员会、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王亚南担任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的召集人。<sup>④</sup>11月4日,教育部高教司召集京津各大学教员30余人座谈政治经济学讲授问题,王亚南参加了座谈会,并被选为政治经济学教学委员会九人成员之一。<sup>⑤</sup>11月10日,清华大学经济系成立教学改进委员会,王亚南亦是委员。19日晚召开第一次会议,有同学代表反映对改进教学的一些意见,王亚南明确提出改委会的三大目标:(1)明确任务,根据高教会的方针,确定经济系的任务及教学方针;(2)改进内容,课程内容均应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要有正确的观点;(3)精简课程,不必要和不合理的课程力求精简以节省同学的学习时间。他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sup>⑥</sup>根据这封信,11月13日清华大学召开“资本论译本通俗化座谈会”,虽然具体情况有待考证,但作为《资本论》中译本的译者,王亚南无疑是这一活动的主要人员。除了在清华授课,1949年6月王亚南还接受北师大历史系的邀请,讲授经济学课程。<sup>⑦</sup>

王亚南还应邀做了一些临时性的讲座。1949年6月24日清华教授成立马列学说研究会,每月集会一次,由主讲人报告其研究所得,然后展开讨论。其中王亚南讲“马列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sup>⑧</sup>8月2日,应邀参加青年团中宣部与《中国青年》社的座谈会,座谈青年怎样学习社会科学及《中国青年》怎样帮助青年学习社会科学。<sup>⑨</sup>1950年1月27日清华大学文法学院出发参加京郊土改前,组织学习土改理论与政策,请3位同志作了讲演,其中王亚南讲“中国土地改革理论基本问题”。<sup>⑩</sup>

校务方面,1949年10月清华大学准备召开代表大会,王亚南被聘为大会代表。次年2月被选为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者工会代表,在2月1日清华大学工会总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副

① 《文管会合理改订薪额 制定大学教职员工警薪给标准》,《人民日报》1949年5月6日,第2版;《清华北大师大教职员工展开薪给评定工作 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办法》,《人民日报》1949年5月22日,第2版;《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评定支薪数额清册》,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下册,第1027页。

② 《一九四〇年度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名册》,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号020—003—0109—001,转引自黄瑶等《百年传承:中山大学法科学人:1924—1953》,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82页。

③ 王眉生:《政治经济学学习在清华》,《光明日报》1949年12月17日,第3版。

④ 陈旭、贺美英、张再兴主编:《清华大学志:1911—2010》第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8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下册,第707—708页。

⑤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5日,第4版。

⑥ 《经济系开始改进教学,成立委员会有三目标》,原载《人民清华》第2期(1949年11月30日),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5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上册,第286—287页。

⑦ 《光明日报》1949年6月30日,第4版;《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49—1976)》中卷,征求意见稿打印件,第34页。

⑧ 本报讯《清华马列研究会积极展开工作》,《光明日报》1949年10月29日,第4版。

⑨ 《人民日报》1949年8月3日,第1版。

⑩ 清华通讯组:《清华师生二百余人出发参加土改,校委会学生会晚会欢送》,《光明日报》1950年1月30日,第4版。

主席兼文教部部长。<sup>①</sup>

这一年王亚南也是著述颇多。在报刊发表文章 10 余篇。鉴于“不到一年工夫,局势发展得太快也太大了”,王亚南 1949 年 7 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已经不适合了,于是王亚南重新编辑《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其中一部分是旧作,一部分虽是旧作但经过改编或增订,再有一部分是新写的,序言落款时间为 1950 年 2 月 15 日,11 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为重版《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写了长达 12 页的《解放后新版序言》,落款时间为 1950 年 2 月 4 日,5 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为了再版《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950 年 6 月离开北京前,王亚南“就只在仓促中,把原书涉猎一遍,将其中二十几处有讹误的字句,给改正过来”。<sup>②</sup>

王亚南还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现在可查知的有 1949 年 7 月 8 日中国经济学研究者及经济工作者 30 余人开会发起组织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王亚南被选为总筹备会常务委员 19 人之一;7 月 14—17 日又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7 月 17 日作为发起人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sup>③</sup>

由这封信还可知,1949 年 9 月胡体乾前往沈阳农学院任教,去之前与王亚南有数小时的长谈,并且随着解放,胡体乾的思想也有进步。

这封信中的“陶先生”和下一封信中的“陶所长”,均指陶孟和(1888—1960),原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祖籍绍兴,生于天津,著名社会学家。1926 年后担任社会调查部(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研究所)所长,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第三通:1951 年 2 月 8 日致彭泽益

泽益老弟:

二月九日信由胡先生转交。我一直以为你到武大去了,原来还在南京。我到厦大已经有八个月之久,学校一切虽上了轨道,但因厦门逼处前线,不时有一些突出任务。我还教几门功课,也还有一些时间读书。因为学校行政部门负责人都很得力,我就乐得忙里偷闲了。倒是在清华的那一年,才真是忙得可以。最近我在《新中华》(笔者按:原信无书名号,系笔者所加)发表《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十讲,大概最近可以开始登。在清华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最近又在此间经济研究所讲授,拟陆续写出来。好在身体比以前好了,夜间可以作一些事。科院聘我为专门委员,去年就收到了聘书,陶所长及你的推荐,我衷心是感到非常光荣的。前不久曾函郭院长探问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物,院中把“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寄来,都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我意“中国科学”第一期全登自然科学方面稿,只在最后附一篇历史方面的东西,似不妥当;要登,就应多登几篇,否则就让它变为自然科学的专刊。此意反映上去,上□院里来信说可以考虑。社会研究所各方面的情况,希望告诉我一点,出版物请寄我一份,看我有否有时间可以抽出来写点东西。这里经济研究所由胡先生代为主持,学生中有几个很特出的。福州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全人马都来了。这里讲师、助教级有很多优秀份(分)子,我尝为此感到慰藉。你近来的写作生活怎样?希孟先生我在十一月初见到,身体还是很不好,工作似还未确定。薛祀光先生在新法学院受训年余,最近也要到厦大来了。要开会去,再见。

祝好,代向

陶先生请安

①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 5 卷《解放接管与院系调整时期》上册,第 282 页;下册,第 763、770 页。

② 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再版序言”,上海:中华书局 1950 年再版,第 18 页。

③ 《光明日报》1949 年 7 月 11 日,第 1 版;7 月 14 日,第 1 版;7 月 17 日,第 1 版。

按:信封左上为中英文“国立厦门大学”,并有英文地址:AMOY,FUKING,CHINA。信封正面:“南京鸡鸣寺路一号社会研究所彭泽益先生/王斌”。背面贴1950年发行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邮票,面额800元。信封背面有彭泽益手写“3/14复”字样。信纸左下印有“校长办公室便条”。背面有厦门、南京邮戳,其时间难以辨认,落款也无年份,但从信中王亚南自述“到厦大已有八个月”,可推知此信时间为1951年2月8日。

这封信提供了不少信息。第一,王亚南到厦大8个月,对学校行政、讲师助教和学生都很满意。经济研究所是1950年暑假后成立的,王亚南兼任所长,从这封信可知是由胡体乾代为主持。第二,由于行政部门得力,王亚南的身体也有所改善,能够有时间授课、读书、著述。从信中可知,王亚南准备写作出版《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二十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可惜这两部书都没有完成出版,前者仅在《新中华》分4期发表《广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凡》《贯彻在广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诸原则》两篇。第三,王亚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此事王亚南传记和厦大校史均失载。<sup>①</sup>1950年10月,经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备案,中国科学院聘任第一批专门委员,王亚南被聘为社会经济组(共12人)专门委员。<sup>②</sup>专门委员具有学术顾问性质,为名誉职,1953年酝酿学部委员,专门委员制度即告结束。信中还可以看到,王亚南当选为专门委员后写信向中国科学院提出了对于期刊的意见。当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方面的副院长为陈伯达和陶孟和,陈伯达属于兼任挂名,实际是陶孟和负责;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仅社会研究所,所长仍是陶孟和,陶孟和指定彭泽益代理职务,社会科学专门委员的聘任多少与陶孟和、彭泽益有些关系,所以信里提到陶、彭的“推荐”。

程希孟回国后,1952年6月才安排到国际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此信中提到王亚南曾在1950年11月见过程希孟。至于见面地点在北京还是其他地方,难以稽考了。

薛祀光(1900—1987),字声远,浙江瑞安人,1928年至1948年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思想进步,与王亚南熟悉。信中所说“在新法学院受训年余”,系新法学研究院之简称,该院由新法学研究会创办于1949年7月,宗旨是改造旧法律界及司法人员。薛祀光为该院第一期学员,1950年1月4日开学,1951年1月21日结业。<sup>③</sup>由此信可知薛祀光结业前王亚南已经聘请他到厦大工作。实际上王亚南写此信时薛祀光刚刚结业。

除上述三通信函外,笔者还搜寻到2通信函和12篇独著文章(发言)、6篇联合署名的宣言(提案),联合署名宣言也可收入《全集》。兹罗列如下,必要处略加说明。

信函和文章(发言):

1.《致刘大年》(1955年10月22日),先后收入《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刘大年全集》《刘大年来往书札墨迹选》。<sup>④</sup>后者并收有手迹影印本。年份为编者所注。三处录文第一句“我在九月初寄学部第一封信”,据手迹应为“第一号信”。又信末原有“第二号信”,三处录文均缺。

2.《致人民出版社负责同志》(1955年12月14日),收入《人民出版社藏名家书信》,<sup>⑤</sup>落款时间为“12.14”,无年份。信中说“《中国经济原论》订正稿,原在十一月中完成,因我到农村视察去了

① 《厦门大学校史大事记(1949.10—1991.12)》只记录卢嘉锡和郑重膺选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厦门大学档案馆、厦门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厦门大学校史》第2卷(1949—1991),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② 李真真编:《中国科学院史料汇编(1950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4年编印,第148页。

③ 《新法学研究院院刊》第2期,1951年3月31日。

④ 王玉璞、朱薇编:《刘大年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刘大年著,张海鹏主编:《刘大年全集》第11卷《书信(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4页;赵庆云、马忠文编:《刘大年来往书札墨迹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2—163页。

⑤ 人民出版社编:《人民出版社藏名家书信》,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7页。

两周,所以延到此刻才寄上”“书名改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大概你们可以同意”。按:《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5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增订版序言》落款时间为1955年11月22日,故此信当写于1955年12月14日。

3.《由日本政治经济形态论到日本最近政治外交动态》,《扫荡报》(重庆)1939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三科编印《敌情研究》1939年第13期转载。

4.《德国社会经济体制解剖》,研究与批评社编辑发行《研究与批评》第3期,1942年2月1日出版,文末说明“本文系在中大经济学会演讲词,由李世棣君笔记,特此志谢”。

5.《论做官与发财》,长沙《民意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48年。

6.《关于〈中国经济原论〉答杨奎章先生》,《文汇报》(香港)1949年2月14日。

7.《新经济学界的研究方向》,《文汇报》(香港)1949年3月28日。

8.《论社会转形中的中上层知识分子》,《文汇报》(香港)1949年4月15日,第5版;《文汇报》(上海)1949年6月27日,第5版。

9.《论城乡间的社会经济问题》,《光明日报》1949年8月5日《经济周刊》第5期。

10.《论政治经济学的新任务》,《光明日报》1949年9月30日《经济周刊》第13期。

11.《参加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的收获》(系在《光明日报》1953年9月22日邀请参加全国综合大学会议的各大行政区高教局和各综合大学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光明日报》1953年10月7日。

12.《从胡风集团反革命事件中受到的深刻教育》,《光明日报》1955年6月19日。

13.《拥护发行胜利公债》,《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5日,第2版(原题《师大清华两教授拥护发行胜利公债》,另一教授为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马特)。

14.《厦大的经济研究所是怎样办的》,《经济周报》11卷18期,1950年11月2日。

联合署名宣言(提案):

1.《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6月4日,《大公报》(香港版)1948年6月5日;《书报精华》月刊第42期,1948年6月15日。

2.《中国文化工商界三九〇人纠正美国驻日政治顾问的声明》,《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7月2日,《大公报》(天津版)1948年7月4日。

3.《港文化界发表宣言 反对释放冈村宁次》,《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2月25日。

4.《港文化界发表宣言 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2日。

5.《清华大学在校教职员发表对美国国务院白皮书看法》,《人民日报》1949年8月26日,第1版(原题《根绝幻想坚决斗争到底,各界严斥美帝白皮书,清华大学在校教职员发表对白皮书看法,要以全力为人民服务,湔雪“赔款学校”的耻辱》)。

6.《加强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并依法严惩各种罪犯,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第八号提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秘书处印:《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合订本》第2册,1955年7月27日。

《全集》卷帙浩繁,成于众手,难免出现差错。如《跟青年教师谈谈怎样治学》,《全集》注出处《光明日报》误为1978年10月13日,应为12日。《政治经济学上的中国经济现象形态——略论有关中国经济形态的几种认识》,原载《福建研究院研究汇报》,《全集》第17卷第269页注为1947年第1卷第2期,第20卷第493页注为1947年6月第2号。按:此《研究汇报》无卷号,其第2期有两个版本,1946年12月单独出版仅社会科学部分;1947年6月出版包括社会科学、动植物、工业、农林四个部分。第20卷第273页致舒新城函,未注明年份,其实原出处《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手迹》注明年份为1947年,同卷著译系年第515页亦注明年份。